

※學術會議※

「中日韓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會議報導

唐梓彬、黃梓勇 *

一、會議介紹

由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和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聯合舉辦的「中日韓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於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七至二十八日假香港浸會大學召開。來自中國內地、美國、英國、德國、日本、韓國、臺灣、香港和澳門等九個國家和地區的六十多位著名專家學者參與會議，總共發表論文四十二篇。

此次研討會是首次以「中、日、韓經學」為主題舉辦的學術研討會，與會學者圍繞「中、日、韓儒家經典詮釋異同」和「傳統文化差異與儒家經典研究」兩個主題，通過論文發表與小組研討相結合的方式，廣泛而深入地探討和交流了中、日、韓經學相關問題的最新研究成果及儒家文化在中、日、韓三地的傳承發展，提出了很多有價值的新觀點，既推進了經學研究的發展，更引起了大家對中、日、韓經學的關注。

會議包括專題演講和分組討論兩部分。大會邀請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林慶彰教授、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夏含夷 (Edward L. Shaughnessy) 教授及廣島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野間文史教授作專題演講，分別就日本的經學目錄、《詩經》與《周易》、《春秋左氏傳》，進行了精彩的論述。

* 唐梓彬，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碩士生。黃梓勇，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生。

二、專題演講內容摘要

三場專題演講均於會議首日舉行。林慶彰教授的演講題為〈安井小太郎編纂經學入門書目的意義〉，鑒於清末民初以來，中國曾編寫了各種「國學」入門書目，而並沒有專門的經學入門書目，因而一九三三年在日本由大東文化學院研究部印行安井小太郎所編的《經學門徑書目》，便是中、日、韓研究經學的大事情。林教授的演講即針對這本東亞唯一的經學入門書目，嘗試發掘其中的意義。林教授從安井氏自身的生平和學習經歷，以及《經學門徑書目》所收二九四種中、日學者經學著作和其提要中，歸納出是書的學術立場及學術意義：其一，自日本江戶時代中期起，經學著作的步調，往往比中國還要快，譬如：山井鼎的《七經孟子考文》傳入中國後，阮元用來作為校勘《十三經注疏》的主要材料，對阮元作《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是頗有幫助的。另外，經學家太宰春臺作《詩書古傳》、《論語古訓》、《論語古訓外傳》，都比中國阮元、陳鱣同類型的著作要早六、七十年。而安井氏這部經學入門書目又是一例。經學自中國傳到日本，在中國流行編輯國學入門書目之際，安井氏發揮他的經學素養，編輯一份經學入門書目，這證明了中國沒有的，日本也可以有，這也是日本經學獨立發展的重要例證。其二，安井氏所以能在經學上有較大的成就，得力於外祖父安井息軒和島田篁村、草場船山等老師的細心教導，再加上為江戶時代經學家撰寫經學著作解題，有整整四年的歷練，於七十六歲時完成《經學門徑書目》，正是種種主客觀條件綜合而成的結果。其三，是書所錄，中、日著作並重，既無今、古文經學成見，亦無漢、宋學相爭的遺風，可見是書對經學著作的態度持平，加之各書之解題文字儘量簡潔，但都能抓住重點來批評。總結而言，林教授指出這本《經學門徑書目》代表安井氏研究經學七十年的心血結晶，雖已出版近八十年，但用來作為今天的經學入門書目，仍舊不會過時。

夏含夷教授主講〈興與象：簡論占卜和詩歌的關係及其對《詩經》和《周易》的形成之影響〉。自二十世紀以來，一些文學批評家提出《周易》可以視作從商代甲骨卜辭到《詩經》的媒介，有的甚至論證《周易》和《詩經》在文學形式上非常相似，認為這至少表明兩部書來自同樣的文化環境。夏教授則進一步指出《周易》和《詩經》的關係不僅僅是在形式上，我們應該也可以發現《詩》的神學意義。故夏教授從中國古代占卜考察《周易》的原來性質和形式，然後再從《周易》的形式

問題轉到《詩經》的形式和性質，希望從這樣的比較中，能夠體會到前人所未言之新認識。在分析了《史記·孝文本紀》「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啟以光」、《左傳·襄公十年》「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及其相關故事後，夏教授指出這兩段引文正是繇辭，而相關故事中解釋這兩段引文意義的，則是占辭。與〈漸·九三〉的爻辭「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比較，則首三句明顯為繇辭，後兩句為占辭，而無論是「大橫庚庚」、「兆如山陵」之形容兆紋，還是「鴻漸于陸」之自然現象，第一句繇辭明顯都是一個徵兆，而後加上兩句韻語，組成完整的爻辭。在《周易》的爻辭中，可以找到大量相似的用例，但同時也可以找到很多不以三句韻語組成的爻辭，夏教授指出《周易》沒有經過完整的、最後的編輯，現在也不好給它編一個新的樣子。《周易》歷來引起讀者興趣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為它的不完善，讀者找不出一個內在的、不變的系統。而要進一步理解《周易》裏片斷徵兆的象徵意義，夏教授認為我們可以在《詩經》的「興」中，找到一些新的想法。在分析了一首載於《左傳·昭公二十五年》的童謡後，夏教授指出謠與繇的同源關係，不但是語音上的，更是在形式上本來就有一定的共同關係，二者都應用了徵兆的方法。而《詩經》的「興」通常載於一章的開頭，頭兩句話形容大自然的某一現象，後面再接著兩句話說到人間世的事情，其象徵環境和意義往往和《周易》的爻辭有很共同之處。另外，夏教授因應《史記·孝文本紀》「大橫庚庚」的「庚庚」，除了擬聲以外，尚有「更代」的詞義，因而為《詩經》「哀鳴嗷嗷」、「關關雎鳩」提出了新的解釋。最後，夏教授總結地說：「寫這篇文章的目的並不是為了給〈關雎〉作一個新的解釋，而是為了說明《詩經》的『興』和《周易》的『象』（也就是繇辭）在西周宇宙論中如何起著同樣的知識作用，而這個作用與占卜也有密切關係。」

野間文史教授的講題為〈《春秋左氏傳》之構成與基軸〉。野間教授首先以對《左傳》進行概括性觀察為出發點，亦即首要在對分量繁多之內容中，混同多樣性主張的《左傳》通書進行鳥瞰性的眺望。由多樣性、多元性的觀點，簡單概述《左傳》一書之特質。關於《左傳》之多樣性，野間教授基本是從該書的分量，亦即「字數」多寡來立論；至於《左傳》之多元性，則從其集聚「列國史」的這一特點來考察。他指出《左傳》經文字數的多寡（多樣性），在先秦典籍中只有《呂氏春秋》可與之相比，即使是西漢初年的《淮南子》，分量也不及《左傳》，因而我們可以設想，《左傳》或許如《呂氏春秋》的成書過程一樣，其背後也許存在著巨大

的支持力量。另一方面，就《左傳》的多元性問題，野間教授也以統計的方法，得出《左傳》取材「列國史」特點的看法。野間教授繼而聚焦於該書極具特徵之部分，在解讀其內容之過程中，同時考察《左傳》之中心、基軸究竟在何處。他統計了字數超過二千字的年次傳文，多與戰爭有關，因而《左傳》的第一個特色和中心就是在於戰爭，而進一步考核《左傳》中所記大型戰役的分布，則多偏於中期，且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戰事的主人公皆為晉國。而《左傳》中有關春秋後期史事的特徵性記載，則在於對諸國內亂的記述，以及以鄭國子產為代表的賢人政治家們的言行之記載。這些主要是從記述字數之多寡來對《左傳》作一概觀的論述。探討的結果就是：《左傳》記述的重心，在春秋前期是將之置於對齊桓公、晉文公稱霸中原、建立體制的描述；進入春秋中期，亦即所謂中原盟主晉國與南方大國楚國之間的攻防時代，則以春秋三大戰為記述的中心；到了春秋末期，《左傳》詳述以鄭國子產為代表的賢人政治時代，並以之為史事記述的中心，此後，則展望即將到來的戰國時代，此堪稱是《左傳》一書大致的撰著結構。最後，野間教授針對所謂《左傳》作者之撰著意圖，從上述的統計結果中推斷，《左傳》或許是以記錄「賢大夫」言論為目的的一部著作，並以此總結演講。

三、會議論文總覽及綜述

第一場第一組 單周堯（香港大學）主持

1. 何廣棟（香港新亞研究所）：〈陳振孫《書》學之研究〉
2. 趙生群（南京師範大學）：〈《左傳》校讀札記〉
3. 張曉生（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傅遜《春秋左傳註解辨誤》述評〉
4. 劉寧（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唐春秋義例學的特點〉

第一場第二組 何志華（香港中文大學）主持

1. 張壽安（中央研究院）：〈清儒「說經」的基礎知識〉

2. 田 浩 (Hoyt Tillman)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郝經論五經〉("Hao Jing's Discussions of the Five Classics")
3. 末永高康 (日本鹿兒島大學)：〈《孔子三朝記》中之名〉
4. 盧鳴東 (香港浸會大學)：〈朝鮮禮圖的編製方法和標準——金長生《家禮輯覽》婚圖研究〉

第二場第一組
張宏生（香港浸會大學）主持

1. 蔡根祥 (高雄師範大學)：〈江永與戴震學術關係研究——以《詩經》學說為討論範圍〉
2. 車行健 (國立政治大學)：〈現代學術獎勵機制觀照下的羅倬漢之經學成就——以《詩樂論》為核心之探討〉
3. 鄭國光 (澳門大學)：〈《春秋》與「素王」：漢代「經學義理」旨釋〉
4. 呂宗力 (香港科技大學)：〈兩晉南北朝經學與讖緯學〉

第二場第二組
陳 致（香港浸會大學）主持

1. 單周堯 (香港大學)：〈竹添光鴻《左氏會箋》論五情說管窺〉
2. 何志華 (香港中文大學)：〈《史記》詮釋《論語》考〉
3. 傅 熊 (Bernhard Fuehrer) (倫敦大學)：〈皇侃《論語義疏》與清代學術〉 ("Huang Kan's Lunyu yishu and Qing Scholarship")
4. 金培懿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作為道德／語文教育教材的《論語》——以近代日本中學校教科書／漢文學參考書所作的考察〉

第三場第一組
汪學群（中國社會科學院）主持

1. 蔡長林 (中央研究院)：〈義理《易》與今文學——皮錫瑞《易學通論》的經學

立場及其意義〉

2. 賴貴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佐藤一齋《易》學初探——以《言志四錄》與〈九卦廣義〉為核心〉
3. 蘇費翔 (Christian Soffel)（慕尼黑大學）：〈《周易》卦名的語義學特徵〉
4. 吳家怡（香港中文大學）：〈《漢書·敘傳》述《易》考〉

第三場第二組
蔣秋華（中央研究院）主持

1. 鄒積意（南開大學）：〈《召誥日名考》的曆學背景及相關問題〉
2. 范麗梅（中央研究院）：〈郭店〈成之聞之〉若干引《書》的詮釋問題〉
3. 牟 堅（中國社會科學院）：〈朱子《中庸》詮釋中的實理觀：「理之實」與「實乎此理之實」〉
4. 宗靜航（香港浸會大學）：〈從詞彙角度淺議〈仲虺之誥〉與〈湯誥〉的成書年代〉

第四場第一組
張壽安（中央研究院）主持

1. 舒大剛（四川大學）：〈邢昺《孝經注疏》雜考〉
2. 丁亞傑（國立中央大學）：〈生命禮儀中的兩性位置：方苞禮學中的女性〉
3. 許子濱（香港嶺南大學）：〈《左傳》「公喪之如稅服終身」解〉

第四場第二組
蔡長林（中央研究院）主持

1. 李雄溪（香港嶺南大學）：〈《小雅·都人士》「綢直如髮」解〉
2. 方向東（南京師範大學）：〈古代尊師禮淺論〉
3. 黃梓勇（香港浸會大學）：〈論章太炎的今古文經學觀〉

第五場第一組

李雄溪（香港嶺南大學）主持

1. 許振興（香港大學）：〈真德秀《大學衍義》的「齊家」思想〉
2. 馮曉庭（國立嘉義大學）：〈從《兼明書》看唐末五代說經方向的轉折〉
3. 黃冠雲（國立清華大學）：〈重構子思學說的兩個定點〉（“Reconstituting the Teachings of Zisi: Two Points of Departure”）

第五場第二組

車行健（國立政治大學）主持

1. 郭鵬飛（香港城市大學）：〈讀王引之《經義述聞·爾雅》札記三則〉
2. 孔炳奭（韓國啟明大學校）：〈《禮記》喪服制度的人文意識〉
3. 鄭時烈（韓國嶺南大學校）：〈退溪《論語釋義》的解釋學的特徵〉

第六場

劉楚華（香港浸會大學）主持

1. 金時晃（韓國慶北大學校）：〈孔子從時俗行夏之時正解〉
2. 汪學群（中國社會科學院）：〈費密經學思想試探——以《弘道書》為例〉
3. 蔣秋華（中央研究院）：〈試論吳汝綸《尚書故》的訓詁——以宗《史記》說為例〉

會議論文涉及的內容相當廣泛，涵蓋了經學研究的各個方面。從與會學者的論題來看，主要集中於以下幾個範疇：

（一）五經研究

五經是此次研討會的重要課題。會議論文以五經研究方面的論文居多，達二十三篇，屬經學研究的焦點。其中涉及禮學和《春秋》經傳方面的論文數量居首位，各有六篇。

《詩經》研究方面，李雄溪發表〈《小雅・都人士》「綢直如髮」解〉，提出「綢直如髮」乃是因遷就押韻而生倒裝句式。蔡根祥〈江永與戴震學術關係研究——以《詩經》學說為討論範圍〉通過對比江永、戴震兩人對《詩經》學說的異同，提出二人具有學術傳承的關係，從而否定了戴震「背師盜名」的學術公案。

《尚書》研究方面，范麗梅發表〈郭店〈成之聞之〉若干引《書》的詮釋問題〉，透過對「允」字詞義範圍的考察，以及對〈君子之於教〉相關段落的解讀，提出郭店〈成之聞之〉中〈君子之於教〉的引《書》部分應用「允」字具有兩個層次的意義，其中體現了一套道德修養與為政導民的理論。宗靜航〈從詞彙角度淺議〈仲虺之誥〉與〈湯誥〉的成書年代〉，從語言詞彙的角度，發現〈仲虺之誥〉的「附勢」、「簡賢」、「聽聞」和〈湯誥〉的「凶害」、「敷虐」五個詞語均不見於先秦典籍，乃屬晚出的詞語，藉此對《古文尚書》之成書年代提出輔證。蔣秋華〈試論吳汝綸《尚書故》的訓詁——以宗《史記》說為例〉，詳細論述了吳汝綸《尚書故》以宗主《史記》來注解經書的得與失。何廣校〈陳振孫《書》學之研究〉，具體論述了陳振孫之《書》學著作、內容特色及真偽淵源。郜積意〈《召誥日名考》的曆學背景及相關問題〉則從曆學的角度，以李銳《召誥日名考》為基礎，討論鄭氏《周書注》的今、古說歸類。

禮學研究方面，朱永高康〈《孔子三朝記》中之名〉，結合先秦文獻和戰國楚竹書等材料，探討有關《孔子三朝記》中「名」的問題。盧鳴東〈朝鮮禮圖的編製方法和標準——金長生《家禮輯覽》婚圖研究〉，屬經學的跨文化傳播研究，論文具體分析了朝鮮禮圖的編製目的、方法和標準，以明家禮文化在韓國的傳承發展。方向東〈古代尊師禮淺論〉，重點論述了「報本反始，崇德而勸學」的尊師禮形式變化、內容及對社會的作用和意義。丁亞傑〈生命禮儀中的兩性位置：方苞禮學中的女性〉，從方苞對冠禮、婚禮、喪禮、祭禮的解釋，探討方苞禮學中的女性意義。孔炳旛〈《禮記》喪服制度的人文意識〉，討論了喪服制度的起源、精神意義、服制差等及其與宗法制度的關係。

《易經》研究方面，蔡長林〈義理《易》與今文學——皮錫瑞《易學通論》的經學立場及其意義〉，藉著探討皮錫瑞《易學通論》的經說，挖掘其背後的價值意識，思考皮錫瑞以史學態度解經的經學意義。賴貴三〈佐藤一齋《易》學初探——以《言志四錄》與〈九卦廣義〉為核心〉，以日本鴻儒佐藤一齋作具體的個案研究，不但整理其生平傳略，又論其《易》學要旨，對理解日本的儒家經典詮釋學及

儒學於日本的發展有極大的裨益。蘇費翔〈《周易》卦名的語義學特徵〉，從語言符號學的角度，分析《周易》卦名在語意、字形、用法和歷代解釋方面的基本規律，藉以見出《周易》早期版本卦名符號性質與語意性質之間的關係。吳家怡〈《漢書·敘傳》述《易》考〉，以《漢書·敘傳》為中心，考察其述《易》諸例，發現班固多借《易經》申明其史學觀點，從而得出班固《漢書》的經學觀當以《易》為首的觀點。

《春秋》經傳研究方面，趙生群〈《左傳》校讀札記〉，參考各家之說，對《春秋左傳》中十八組難解的經文作詳細的析述，訂正了前人注解的疏謬和不足。張曉生〈傅遜《春秋左傳註解辨誤》述評〉，以傅遜《春秋左傳註解辨誤》為研究對象，分析其內容特質，以明其學術史意義。劉寧〈中唐春秋義例學的特點〉，探討了中唐春秋義例學的特點，使學界對中唐春秋學的內涵和整體面貌得出更清晰的認識。鄧國光〈《春秋》與「素王」：漢代「經學義理」旨釋〉，以《春秋》學的「素王」義法討論漢代「經學義理」的內涵。單周堯〈竹添光鴻《左氏會箋》論五情說管窺〉，析述了竹添光鴻《左氏會箋》與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於五情說中的差異，以見中國和日本在儒家經典的詮釋上的分歧。許子濱〈《左傳》「公喪之如稅服終身」解〉，通過考索詞義，提出「公喪之如稅服終身」當語譯為「衛獻公為縗服喪而穿著縗服直到一輩子的終了」，這對理解《左傳》頗有幫助。

（二）其他儒家經典研究

與其他儒家經典相關的論文有七篇，當中涉及《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爾雅》和《孝經》，論域極廣。其中以《論語》的研究為多：何志華發表了〈《史記》詮釋《論語》考〉，論述《史記》詮釋《論語》的方法和旨意。金培懿〈作為道德／語文教育教材的《論語》——以近代日本中學校教科書／漢文學參考書所作的考察〉，以在近代日本作為漢文科教材或參考書的《論語》著作為研究對象，探討這類著作的時代定位、內容特色及其在日本漢學近代化的時代意義。鄭時烈〈退溪《論語釋義》的解釋學的特徵〉，屬韓國經學的研究，該文通過把退溪《論語釋義》的內容分類整理，全面分析了李滉對《論語》的獨創性解釋學的特徵。金時晃〈孔子從時俗行夏之時正解〉，則針對《論語》中孔子「行夏之時」的說法，以《論語》、《孟子》等儒家經典為中心，提出孔子遵從的當是周朝時俗的新解。《大學》研究方面，許振興發表了〈真德秀《大學衍義》的「齊家」

思想》，著力闡釋真德秀的「齊家」思想，並藉此探討其在推衍「齊家」思想後戛然而止的原因。《中庸》研究方面，牟堅〈朱子《中庸》詮釋中的實理觀：「理之實」與「實乎此理之實」〉就著朱子《中庸》詮釋中的「實理」之意涵作一討論。《爾雅》研究方面，郭鵬飛〈讀王引之《經義述聞·爾雅》札記三則〉，仔細地考察了王引之《經義述聞》中《爾雅》的部分，就其可議之處，提出全面的看法。而《孝經》研究方面，舒大剛〈邢昺《孝經注疏》雜考〉，考述了邢昺《孝經注疏》的成書時代及內容特色，補充了前人研究的空白。

(三) 中國經學史研究

與會學者亦頗致力於中國經學史的研究，提交的文章有九篇，論及的範圍上自先秦，下至民國，幾乎囊括了中國經學發展的各個階段。黃冠雲〈重構子思學說的兩個定點〉(“Reconstituting the Teachings of Zisi: Two Points of Departure”)，針對目前子思學說的研究，依據《荀子·非十二子》中關於子思和孟子的論述，提出重構子思學說的兩個標準，以期在研究方法上對先秦經學作進一步的思考。呂宗力〈兩晉南北朝經學與讖緯學〉對讖緯學在兩晉南北朝經學界的影響，進行了論述，深化了學界對兩晉南北朝讖緯學的認知。馮曉庭〈從《兼明書》看唐末五代說經方向的轉折〉，透過深入考察丘光庭的《兼明書》，論析其說經內涵，從而揭示出唐末五代經學研究風氣轉折的歷程。田浩〈郝經論五經〉(“Hao Jing’s Discussions of the Five Classics”)，重點討論元人郝經「古無經史之分」的經學觀點，並以此考察其對五經歷史演變和互相配合的關係。傅熊〈皇侃《論語義疏》與清代學術〉(“Huang Kan’s Lunyu yishu and Qing Scholarship”)針對皇侃《論語義疏》一書的流傳、整理及分析清代學者重新發現此書的過程。汪學群〈費密經學思想試探——以《弘道書》為例〉具體深研費密的經學思想，以為其經學思想的最大特色，在建立了不同於理學家道統論的經道關係論。張壽安〈清儒「說經」的基礎知識〉通過考察惠棟、盧文弨、戴震、阮元、焦循等清儒的說經方法，對學術界普遍認為清代乾嘉學術以考據作為治學方法的觀點，重新檢討，指出清儒說經所用的方法還包括天文、曆算、地理、名物、象數、典章等工具性的技藝知識，並非只有小學和考據。黃梓勇〈論章太炎的今古文經學觀〉在梳理章太炎今古文經學觀念的建立和發展脈絡的基礎上，討論今、古文經學觀念的內涵問題，修正過往學界種種解讀的不準確處，更補充了過往學界側重於討論清代今文學的偏執傾向。車行健〈現代學術獎勵機制

觀照下的羅倬漢之經學成就——以《詩樂論》為核心之探討〉從現代學術獎勵機制的新穎視角，客觀評價羅倬漢的經學成就及學術地位。

四、結語

此次會議以中、日、韓經學為題，各方學者發表論文共四十二篇，當中與日本經學相關的有四篇，與韓國經學相關的則有兩篇。正如在閉幕式上，林慶彰教授所言，現階段日、韓經學的研究尚在起步階段，期待此會議能舉辦第二屆、第三屆，引起更多同人投入研究中、日、韓經學的相關課題。